

《死海古卷与新约》

Benjamin Wol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都柏林三一学院)

Benjamin Wold (沃德铭) 著

施文华 (Wenhua SHI) 译

作者简介

沃德铭 (Benjamin Wold)，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博士，现任都柏林三一学院古代犹太教与基督教研究教授。主要著作包括 *4QInstruction: Divisions and Hierarchies* (Brill, 2017) 与 *Qumran Wisdom and the New Testa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研究方向为古代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中的祈祷传统。

电子邮箱: woldb@tcd.ie

译者简介

施文华 (Wenhua SHI)，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博士，新约与保罗书信研究学者，现为都柏林三一学院 圣经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 *Paul's Message of the Cross as Body Language* (Mohr Siebeck, 2008) 与《保罗与保罗书信》(三联出版社, 2022)。研究领域包括新约研究、古典修辞学、圣经考古学及死海古卷研究。

电子邮箱: swhttc@hotmail.com

内容摘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库姆兰出土的多部此前未见的智慧文学文献相继刊布，显著重塑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智慧传统的研究图景。在此学术背景下，本文重新审视《死海古卷》与新约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不预设二者之间的直接影响，而是将其置于共享的思想与宗教语境中加以考察。重点讨论库姆兰文献的内部多样性、对原本并非作为统一文集形成的文本进行比较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以及相关研究对理解早期基督教在古代犹太教整体谱系中位置的启示。通过对经文诠释、智慧与启示传统、群体身份建构及末世论期待等主题的分析，本文既揭示二者之间的重要关联，也强调其重要差异。

关键词：

死海古卷；新约；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犹太智慧文学；早期基督教；方法论

序言

《死海古卷》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无可比拟的文献遗存，为理解早期基督教及其文学的历史、宗教与文化背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关于库姆兰出土文献对早期基督教的重要性，学界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死海古卷》与《新约》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一表述本身蕴含方法论上的复杂性：无论是《死海古卷》还是《新约》，最初都并非以统一文集的形式构想，而是因特定的历史进程而逐渐被汇集并获得“典籍”的地位。例如，《新约》之所以成为一个明确的文献集合，是在漫长的甄选与编纂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间决定了哪些作品被纳入或排除。

将本讨论的焦点界定为“库姆兰文献对早期基督教的重要性”，有助于采取一种更为细腻的研究视角：既尊重《新约》各文献的独立性与多样性，又关注其不同的来源背景，同时强调正典之外犹太文学传统的重要性。

同样，库姆兰出土的文献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单一文集。这些古卷内容丰富，涵盖多种文体，反映了不同社群的社会背景及其被存放于死海地区的历史情境，而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焦点。有学者尝试将库姆兰文献描述为一个依照意识形态或语言标准整理的“图书馆”，但这一看法需谨慎对待。与其称之为“死海古卷合集”，不如使用“库姆兰发现”这一表述，以更准确地呈现其内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早期关于这些文献的研究常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一些学者过于直接地假设库姆兰文本对早期基督教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设想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遗传性”联系。例如，有学者试图将古卷中的人物与《新约》文本中的具体人物相对应，或认为早期基督教历史直接受到了库姆兰的塑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学界更强调二者所共享的文化和文本语境，同时更加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对照。

近年来，关于库姆兰出土文献的研究通常将其划分为三大类别：（1）现今《希伯来圣经》所收录的作品；（2）具有明确雅哈德（*Yahad*，即所谓“宗派”）背景的著作；（3）更为广泛的犹太文学，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社群。早期学者对这些分类的处理往往过于简化，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大部分手稿出版长期延宕有关——新出土的古卷常被仓促地归类为“圣经文本”或“宗派文献”（通常被认为与艾赛尼派有关）。

库姆兰出土文本更应被理解为哈斯蒙尼王朝及罗马时期巴勒斯坦犹太教的物质与思想文化的产物。这些文献为探讨早期基督教兴起的宗教与社会语境提供了关键参照。在此语境下，“巴勒斯坦”一词是指第二圣殿时期哈斯蒙尼与罗马统治下的犹太、加利利及其周边地区。在死海古卷出土之前，能够明确归属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文献仅限于骨匣铭文与碑刻（Brooke 2005, XVII）。尽管《旧约次经》和《伪经》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犹太文学传统，但它们并不具有明确的巴勒斯坦地域归属。

1. 研究阶段与早期方法

关于库姆兰发现对于早期基督教的重要性之研究，其发展历程已由乔治·布鲁克（George J. Brooke, 2005, 3–18）与约尔格·弗雷（Jörg Frey, 2006, 408–19）等学者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这一阶段性的研究史清晰地表明，死海古卷的出土时间与出版进程如何直接影响了学界对于该主题的基本假设与方法论取向。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其前后研究格局发生了显著转变。

死海古卷的十一座藏卷洞窟出土于1947年至1956年之间，但最早公布的手稿主要来自第1号洞穴（Cave 1），其中尤以与雅哈德团体（*Yahad*）相关的文本为代表。由于早期公布的文本数量有限，学界对库姆兰文献的初步认知受到一定局限，尤其集中于以下几部核心文献：

- 《社团规则》（1QS）

- 《哈巴谷书注释》（1QpHab）
- 《感恩诗集》（1QHa）
- 《战卷》（1QM）

这些文本在研究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在整体发现的文本总量中仅占极小一部分。

由于大多数死海古卷的出版长期延宕，直到 1991 年本-锡安·瓦霍尔德（Ben-Zion Wacholder）与马丁·阿贝格（Martin Abegg）发布《摹本版》（*Facsimile Edition*）之后，才迎来了一个研究上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1990 年代以前的研究大多基于推测，且往往将这些文本解读为某一“宗派”社群的产物。相比之下，1990 年代之后的学术研究得以在全面掌握文本全貌的基础上展开，从而更细致地理解库姆兰文献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自 1990 年代至 2010 年间，许多手稿陆续被整理出版，收录于权威学术丛书《犹太沙漠的发现》（*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 DJD*）之中。这些文献在体裁和内容上极为丰富，至今仍为早期基督教研究提供着新的启发和洞见，包括：

- 礼仪文献（*liturgy*）
- 法律议题（*legal issues*）
- 驱魔传统（*exorcism*）
- 智慧文学（*wisdom*）
- 启示文学（*apocalypticism*）
- 历法文本（*calendar*）

1.1 四个研究阶段

关于库姆兰文献与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历程，可以通过关键学者的贡献、方法论的演变以及手稿可获得性的变化加以梳理。总体而言，这一研究史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约 1948–1955 年）

在这一最早期阶段，死海古卷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由于当时学者仅能接触到第 1 号洞穴出土的少量手稿——这些也是最早公开的文本——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由于这些早期公布的文献多为“宗派”性质的作品，学界对于这些发现与《新约》文学的相关性讨论，主要受到此类文本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手稿的年代和来源，同时尝试辨识与《新约》文本之间的相似性，例如词汇使用的对应关系和二元论思想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卡尔·G·库恩（Karl G. Kuhn, 1950）在这一阶段发表了几篇简短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古卷与早期基督教潜在关联的最早观察之一。另一位重要的早期研究者是威廉·F·奥尔布赖特（William F. Albright, 1954），他对《约翰福音》与库姆兰文献关系的探索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约 1955–1980 年）

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随着学界对死海古卷重要性的广泛认知，研究热度显著提升。这一时期学术兴趣的高涨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1. 《犹太沙漠的发现》（*DJD*）系列中收录了第 1 号洞穴手稿的批判性版本；
2. 英语译本的出版（尤其是盖扎·维美斯 [Geza Vermes, 1977] 的译本）及其他研究资料的出现，使这些文本能够为更广泛的学界和公众所接触；
3. 一些流行的理论和误解将库姆兰社群与基督教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声称耶稣或施洗约翰与艾赛尼派存在联系，这些观点激发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

尽管这些大胆的理论引发了广泛关注，但它们也促使学界采用更加谨慎和严谨的方法进行评估。在这一阶段，研究者逐渐达成共识：库姆兰文献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确实存在重要关联，但这种关系并非“遗传性”或直接的因果影响。研究的重心也从单纯强调希腊化犹太教或“诺斯替主义”的背景，逐渐转向将早期基督教置于巴勒斯坦犹太传统的语境之中，而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库姆兰文献研究的推动。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新的重要手稿的公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圣殿古卷》（*Temple Scroll*），由伊加尔·雅丁（Yigael Yadin）于1977年以三卷本希伯来语版本出版。作为迄今发现的最长古卷，其发表成为库姆兰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这一时期涌现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 1950年代，戴维·弗卢瑟（David Flusser）在多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奥斯卡·库尔曼（Oscar Cullmann）探讨了基督教的起源；雷蒙德·E·布朗（Raymond E. Brown）专注于《约翰著作》的研究；奥托·贝茨（Otto Betz）分析了《福音书》的平行文本。
- 1960年代，马修·布莱克（Matthew Black）推进了对基督教起源的研究；约瑟夫·A·菲茨迈尔（Joseph A. Fitzmyer）考察了《新约》的闪语背景；赫伯特·布劳恩（Herbert Braun）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两卷著作，对库姆兰文献与《新约》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
- 1970年代，詹姆斯·H·查尔斯沃斯（James H. Charlesworth）研究了《约翰福音》与耶稣的关系；E. P. 桑德斯（E. P. Sanders）于1977年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比较研究为主，学者们广泛整理了第1号洞穴手稿与《新约》文学的平行文本。然而，尽管对比研究成果丰富，却常常缺乏系统性的综合框架，使得对库姆兰文献整体意义的理解仍显零散。

第三阶段（约1980–1991年）

布鲁克（Brooke）和弗雷（Frey）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停滞”与“放弃”的阶段，反映出学界对该主题的兴趣明显下降。这一研究低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手稿的出版长期拖延，尤其是来自第4号洞穴（Cave 4）的文本——其数量约占所有发现的三分之二。由于这些文献尚未公开，研究者受制于资料的缺乏，导致该领域的整体进展陷入停滞。

第四阶段（1991年至今）

1991年，瓦霍尔德（Wacholder）与阿贝格（Abegg）出版了《死海古卷》的摹本版，这一事件促使第4号洞穴材料的迅速发表，并最终被收录进《犹太沙漠的发现》（*DJD*）系列。这些关键文本的公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卷研究的格局，为该领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时代，也重新界定了死海古卷在早期基督教研究中的重要性。

随着大量此前未知的文本问世（尽管其中许多为残篇），库姆兰发现所展现出的巨大多样性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对于早期基督教研究而言，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学者开始深入探讨此前未被充分研究的主题，更加细致地分析库姆兰社群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复杂关系，超越早期的简单化解释。学界对这些文献多重层面的认识也显著深化，这一转向推动了方法论的创新，并持续塑造着当代相关研究的方向。

1.2 直接联系理论

在库姆兰古卷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史中，学界曾提出多种基于文本对比的假设，试图论证二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这些理论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讨论，但多数都在后来遭到了严格的批判性审视。从时间脉络来看，相关研究可通过若干代表性案例及其学术反响加以概述。安德

烈·杜邦-索梅（André Dupont-Sommer）是这一研究方向的早期且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库姆兰的“正义之师”（Teacher of Righteousness）预示了耶稣，并将这位“正义之师”描绘为一位先驱人物，其生平与使命在诸多方面预表了早期基督教的核心特征（Dupont-Sommer, 1952）。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开创性，但后来被批评为过于推测、过于简化，忽视了库姆兰与基督教在神学与历史上的根本差异。

在随后的十年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955）关注于弥赛亚期待、社群结构与启示论等主题的相似性，并提出库姆兰“宗派”与早期基督徒之间在起源与思想体系上可能具有平行的发展路径。大约同期，《死海古卷》原始出版团队成员约翰·阿莱格罗（John Allegro）提出了极具争议的理论。他认为耶稣并非历史人物，而是源于生育崇拜与致幻蘑菇宗教仪式的象征性角色（Allegro, 1970）。这一耸人听闻的观点迅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批评。

20 世纪 70 年代，何塞·奥卡拉甘（José O'Callaghan, 1972）声称第 7 号洞（Cave 7）中的部分残片保存了《新约》文本，尤其是《马可福音》的片段。该观点在 1992 年被卡斯滕·彼得·泰德（Carsten Peter Thiede）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其文本分析方法和结论存在重大缺陷，这一假说未获学界认可。

1990 年代：争议理论的回潮

进入 1990 年代，一些争议性理论重新受到关注，尤其是芭芭拉·席林（Barbara Thiering）的研究。她的观点通过纪录片、杂志和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席林认为，死海古卷记录了施洗约翰与耶稣之间的一场竞争。她将施洗约翰认定为“正义之师”，而耶稣则被等同于“邪恶祭司”（*Wicked Priest*），即“正义之师”的主要对手（Thiering, 1992）。这一观点因其高度推测性而遭到学界广泛批评。

与此同时，赖纳·里斯纳（Rainer Riesner, 1993）探讨了库姆兰社群对施洗约翰的影响，认为二者在实践与事工方面存在重要联系。在 1990 年代晚期，罗伯特·艾森曼（Robert Eisenman, 1996）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假设：基于对库姆兰手稿存在缺陷的年代推断，他主张这些古卷应与耶稣的兄弟雅各（James）相关联。尽管这一理论颇具吸引力，但由于年代学上的矛盾，它在学术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与否定。同期的其他研究则聚焦于社群生活、洁净实践和弥赛亚期待等主题，探讨其对早期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潜在影响。例如，巴吉尔·皮克斯纳（Bargil Pixner, 1990）提出艾赛尼派与早期基督教之间可能存在历史联系，甚至认为艾赛尼派曾在耶路撒冷锡安山设有据点，并将其与“最后的晚餐”及初期教会相联系。

布赖恩·卡珀（Brian Capper, 1995）进一步提出，艾赛尼派的群体生活方式可能影响了早期基督教社群。他认为，《使徒行传》2-5 章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描述，可能受到《社团规则》（Community Rule）和《大马色规则》或称《大马色契约》（the Damascus Document, or the Covenant of Damascus, 简称 CD）等库姆兰文本的影响。

2. 方法论评述

当代关于库姆兰文献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耶稣及其追随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死海古卷》所体现的犹太宗教传统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其他重要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如斐洛（Philo）、约瑟夫（Josephus）、希腊化犹太文学，以及更广泛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宗教与文化背景。过去三十年来，研究方向已逐渐从强调直接依赖关系的模式，转向将《死海古卷》与早期基督教文本视为彼此相互启发、互为参照的材料。这类研究不应仅被视为《新约》的“背景研究”，而应在其自身的文本与文化语境中加以独立评估。方法论的严谨性因此尤为关键。学界已逐步超越早期将库姆兰文献简单视为一个统一“宗派”产物的假设，转而强调其文本群体的多样性，并重视其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更广阔宗教版图中的位置。因此，仅仅寻找库姆兰与早期基督教

之间的表面相似性已不足以推进研究，必须建立更为细致和复杂的解释框架。《死海古卷》研究不仅对犹太文本传统和文化的理解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探讨基督教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尽管该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早期基督教研究仍未充分吸收库姆兰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在文本流动性 (*textual fluidity*) 和抄写实践 (*scribal practices*) 等方面 (Frey, 2024)。这些领域未来或将成为深化两者关系研究的关键突破口。

3. 主要主题

尽管难以对当代学术中多元的研究主题与路径进行简明扼要的总结，但可以概括出十个对该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研究方向：

第一，弥赛亚信仰与基督论：探讨库姆兰文献中的弥赛亚观念及被高举的神圣人物形象，包括与“正义之师” (Teacher of Righteousness) 的比较。

第二，相互启发的文本：考察耶稣的教导与《死海古卷》文本之间的相似性及潜在影响。

第三，身份建构与自我理解：分析耶稣与保罗时代的犹太群体如何通过复杂而精密的传统诠释建构其宗教身份。

第四，圣经传统的传承：其中包括对“正典中的正典” (*canons within canon*) 的考察，即《创世记》《申命记》《以赛亚书》和《诗篇》在库姆兰文献与《新约》中均占据相似的核心地位。此外，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亦译作“文本互涉”) 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视角。在这一方面，早期基督教文学与库姆兰文献常常并用两处或多处经文，显示出二者在诠释传统上的共通性。

第五，圣经诠释与应验释经学：研究库姆兰文献与早期基督教如何采用“应验释经”的框架，例如以耶稣、“正义之师”或“真正的以色列”作为释经的核心。

第六，具体文本的对比研究：例如，《4QMMT》常被用于研究保罗所说的“律法之工” (*works of the law*)，而《4QBeatitudes》有助于理解福音书中的“有福了”句式 (*macarisms*)。

第七，启示文学与时间观：考察时间的分期 (*periodization of time*)、复活、邪恶、撒但、恶魔、天使等主题。与此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库姆兰文献与早期基督教文本中关于末日审判与神圣报应观念的比较。

第八，宗派身份与圣约神学：探讨库姆兰与早期基督教如何通过末世论或律法框架来理解自身为“真正的余民”。

第九，神秘主义与升天传统：研究库姆兰赞美诗和礼仪文本中与早期基督教异象经验相关的元素。

第十，哈拉卡权威与律法诠释：相关研究比较了库姆兰社群与早期基督教领袖如何在犹太律法问题上界定自身立场。

4. 当代研究的轨迹

随着库姆兰文献与早期基督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探索了二者之间多方面的主题交集。鉴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如果按照主题类别展开讨论，往往会过于庞杂，因为许多核心问题跨越多个文本、传统与学科领域。基于这一考虑，以具体的早期基督教文本为中心来组织讨论，能够提供更为清晰的分析框架。

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比较不同文本如何与《死海古卷》中的思想和传统产生互动，也避免了对二者复杂关系的模式化或过度简化处理。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策略能够使核心主题在各自的文本语境中自然浮现，而不受僵硬框架的限制。因此，以下讨论将按照《新约》文献的传统正典顺序展开。这一安排并非出于神学优先性或历史先后次序的考虑，而纯粹出于分析和理解的便利性。

4.1 对观福音

对观传统（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与库姆兰文献之间的关系，或可谓早期基督教研究中最受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对观福音为“历史耶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依据，因其保留了关于耶稣生平与教导的最早层次传统。其次，这些文本呈现出复杂的互文关系——不仅存在于对观福音之间，也体现出与犹太传统（包括库姆兰文献）的互动。对观福音深入探讨了经文的应验、伦理教导与末世论期盼，而这些主题在《死海古卷》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对观福音反映了**文士实践与文本传承过程**的演变，揭示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学更为广泛的发展动态。最后，对观福音所涉及的社会、神学与律法的关切，与犹太群体内部的社会学与哈拉卡（*Halakha*）争论**形成了深刻共鸣**。以下将重点分析对观福音与库姆兰文本在智慧与启示文学、洁净与律法观、圣经诠释方法以及弥赛亚期待等方面的交汇与分歧。

智慧与启示文学

在对观传统（尤其是 Q 文献）中，智慧文学与启示文学的交织反映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文学的整体趋势——两者在这一时期往往并非泾渭分明。《昆兰第 4 洞窟训诲》（4Q415–418, 423; 1Q26）的发现，重新塑造了学界对智慧文学与启示文学关系的理解，显示该时期的“智慧”不仅具有伦理教育功能，同时也带有启示性和末世论维度。

Q 文献通常被归类为智慧传统，因为它包含格言、比喻和伦理教导；但与此同时，它也呈现出典型的启示文学特征，如未来审判、神圣启示以及宇宙性冲突等主题。一些学者强调 Q 文献以“激进智慧”为核心，而另一些学者（如 Goff, 2005）则认为，《昆兰训诲》动摇了传统上“智慧”与“启示”之间的二分对立。

与其将 Q 视为智慧文学或末世论的对立选择，更准确的理解方式是：Q 文献中的智慧是置于启示文学世界观中的，类似于《昆兰第 4 洞窟训诲》，该文本认为智慧源自神圣启示，并且预示着末世奖惩。这一理解使 Q 文献与库姆兰传统建立起联系，在库姆兰文本中，智慧与末世关怀紧密交织，而非彼此独立。对观传统，尤其体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 Q 文献的改写与再诠释之中，进一步精炼并深化了这一综合性理解：耶稣既是智慧的导师，又是一位先知性人物，其智慧本质上与上帝国度突破性临在的宣告密不可分。

洁净与哈拉卡（Purity and Halakha）

雅哈德团体与耶稣的追随者都自视为以色列“真正的余民”，但在社群身份建构与实践方式上却存在显著差异。《社团规则》（1QS 8:20–9:2）记载，雅哈德团体自认为是“公义的余民”，以与堕落世界的隔离为标志，严格遵守哈拉卡（律法），并期待末世中的神圣辩护。加入该社团需要通过严谨的入会仪式（1QS 6:13–23），而罪人则被排除在外（《大马士革规则》CD 20:1–8）。相较之下，耶稣召集的是一个具有复兴性质的“余民”群体，而非排他性的社团；他欢迎罪人、税吏和在礼仪上被视为“不洁”的人（可 2:15–17；路 15:1–7）。库姆兰社群通过隔离来追求圣洁，而耶稣运动则通过餐桌团契、医治行为和天国宣讲来不断拓展群体边界（太 9:10–13；路 14:15–24）。两者都期待上帝的最终审判，但雅哈德团体依靠律法上的纯洁来获得上帝的辩护，而耶稣的追随者则在他的“同在”与“使命”中，预先经历了这一末世应验。

对观福音书与库姆兰文献在哈拉卡上的差异，体现了两者对《妥拉》诠释的根本性分歧。如《社区规则》（1QS 5:13–14）所示，雅哈德团体要求严格与污秽隔离，认为若无律法的公义，浸礼仪式（ritual immersion）即无效。他们对安息日律法的解释（CD 10:14–23）极为严格，禁止了法利赛人和耶稣所允许的行为，如在安息日救助跌入坑中的动物（可 3:1–6；路 14:5）。此外，库姆兰社群还将圣殿洁净律法扩展到日常生活（《圣殿古卷》11QT 48:14–17），而耶稣则直接面对污秽——例如医治麻风病人或触摸尸体——却未因此被视为不洁（可 1:41；5:41）。耶稣并

未废除洁净律法，而是重新诠释其意义，强调“内在污秽”比“外在不洁”更为关键（可 7:15；参 4Q514）。

在饮食律法方面，库姆兰的禁令（CD 12:1-2）超出了《妥拉》的规定；而耶稣的追随者虽然最初仍遵守犹太律法，但最终采取了更为包容的立场（可 7:19；徒 10:15）。对观福音中关于洁净与律法的辩论，正为理解耶稣使命的神学意义提供了重要窗口。

马修·泰森（Matthew Thiessen, 2020）反驳了“耶稣否定犹太洁净律法”的观点，指出耶稣并非废弃律法，而是借由神圣的能力在犹太框架之内重新界定“洁净”的意义——洁净不在于隔离，而在于神能的更新。库姆兰的禁欲主义将圣洁视为需守护的状态，并寄望于末世性的洁净；而耶稣则通过医治带来当下的洁净，实现洁净的“现在时”。与库姆兰的严格律法主义不同，耶稣在哈拉卡辩论中并不拒斥律法，而是强调包容胜于排斥。他所展现的“可传染的圣洁”（contagious holiness）颠覆了污秽与圣洁的界限，标志着一场神学性的转向：库姆兰社团以退隐通寻求洁净，而耶稣则以恢复和医治实现上帝国度的临在，其圣洁源自更新，而非限制。

塞西莉亚·瓦森（Cecilia Wassén, 2024）对耶稣的律法推理方式与库姆兰社团的哈拉卡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与泰森（Thiessen）类似，她否定了“耶稣废弃犹太洁净律法”的看法，主张耶稣是在“上帝国度”理念的引导下重新诠释这些律法。然而，不同于泰森主要强调耶稣通过神圣能力洁净污秽之人的转化性角色，瓦森将耶稣置于更为广阔的犹太律法语境中，突出“文本基础哈拉卡”（如库姆兰严格的诠释传统）与“传统基础的哈拉卡”（主导主流犹太实践）之间的差异。瓦森认为，耶稣并未采纳库姆兰那种严格、末世论驱动的律法主义模，而是运用常识性与伦理性的推理方式，更多诉诸于广泛认可的犹太习俗，而非对圣经文本的严格释义

（exegesis）。在遵守安息日与洁净律法等议题上，耶稣更强调道德洁净而非仪式洁净，展现出一种在库姆兰社团排他性、分离主义取向中几乎缺席的情境性灵活性。

通过将耶稣置于多元的犹太律法传统之中，瓦森描绘出一位并非系统性的律法改革者，而是具现实判断力的末世论教师——其哈拉卡推理方式与库姆兰社团所体现的严格文本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弥赛亚观

死海古卷展现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中弥赛亚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理解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弥赛亚期待提供了重要背景。库姆兰文本并不主张单一的弥赛亚形象，而是反映了多种不同的弥赛亚角色，其中许多主题与福音书中的概念相呼应。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期待是双重弥赛亚模式，即亚伦的祭司弥赛亚和以色列的王室弥赛亚，二者共同承担恢复正确崇拜与政治主权的任务（见《社团规则》1QS、《大马士革文献》CD）。这一观念与早期基督教中耶稣作为单一弥赛亚的身份形成对比，但可能有助于理解当时犹太群体对弥赛亚角色的多种期待，并说明为何耶稣的身份会引发当代的争论。

与此同时，《战卷》中的大卫式战士弥赛亚展现了一场末世性的战斗，光明与黑暗的势力彼此对抗。这一图像在某些早期基督教的启示传统中亦有所呼应（如《启示录》），但与耶稣作为受苦并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被称为“上帝之子”的文本（4Q246）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一图景：它以类似圣经中大卫王权的语言来描绘一位末世性人物，同时又暗示其拥有天上的、超越性的地位。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此类描述是否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犹太思想框架，用以理解弥赛亚的神性，并最终与早期基督论的主张发生交汇？在诸如《会众规则》

（1QSa）等文献中，还描绘了一场由祭司性和大卫性弥赛亚（a priestly and Davidic messiah）主持的“末世筵席”或“弥赛亚盛宴”，这一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与耶稣的“最后晚餐”（马太福音 26:29；路加福音 22:16）形成对照。综合来看，这些文本显示，第二圣殿晚期的犹太弥赛亚期待

具有相当的多样性与流动性，涉及王权、祭司职任、神圣复兴与末世审判等多重主题（Collins 2010）。

在对 4Q521（“弥赛亚启示录”）的解读中，关于复活行为的主动者是谁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尤其是在该文献与《马太福音》11:2-6 和《路加福音》7:18-23 的平行段落关系之下。4Q521 也许是所有库姆兰出土文献中，与对观福音传统及弥赛亚观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份文献（Wold 2012）。在这份库姆兰文本与对观福音的相关段落中，一系列神圣作为——包括治愈病人、释放囚犯以及使死人复活——被呈现为末世复兴的标志，从而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行为究竟是由上帝亲自施行，还是通过一位弥赛亚人物实现？一些学者认为，该残卷描绘了一位作为上帝神迹中介的弥赛亚，这些神迹——包括复活在内——是借由这位弥赛亚代理人完成的。因此，4Q521 中的这一人物形象为受膏者以上帝代理人身份施展神迹提供了重要的先例。这些残片凸显出犹太弥赛亚期待的复杂性，其中先知式的代理与复活的主题彼此交织，既预示又呼应了早期基督教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对耶稣在末世救赎中角色的刻画。

魔鬼与驱魔

对观福音与库姆兰文本中关于魔鬼与驱魔的研究，揭示出第二圣殿时期犹太启示论世界观中存在显著的连续性与差异。这两种传统都预设了魔鬼（或邪灵）的存在，并认为它们会对人类造成侵扰，然而在应对方式与背后的神学框架上却展现出明显不同。斯图肯布鲁克（Stuckenbruck, 2014, 161-186）将对观福音中关于魔鬼起源的观念与犹太启示传统相联系，特别是与以诺文学中关于堕落天使及其巨人后裔的神话相对应——这一传统在库姆兰出土的多部文献中得以保存（见《死海古卷文献集》*DJD* 31, 36, 37）。按照该传统，魔鬼的起源可追溯至洪水中灭亡的巨人——他们的灵魂因失去肉身而成为游离的幽灵，渴望通过附身于人类重新获得身体寄居之所。尽管对观福音并未明确提及这一神话背景，但其叙述中默认魔鬼为“污秽之灵”或“邪灵”，并将耶稣的驱魔行为呈现为神圣权能战胜恶势力的体现。斯图肯布鲁克指出，这一背景框架有助于解释福音书中魔鬼对身体寄居的渴望，以及其在末世性场景中的最终失败。耶稣对魔鬼的权柄不仅仅具有治疗功能，更标志着上帝国度的降临，从而实现启示传统中上帝最终战胜恶势力的预期。

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 2017）在研究死海古卷与对观福音中的魔鬼观时，强调两者在对魔鬼存在的认知上存在一致性，但在应对策略上却有所不同。早期犹太文献（包括库姆兰文本）普遍展现出两种主要的防御模式：其一是驱魔（exorcism），即作为对已发生附身现象的补救性应对；其二为避邪实践（apotropaic practices），旨在通过预防手段避免邪灵的干预。库姆兰的一些重要文本，如《贤者之歌》（4Q510-511）、4QExorcism（4Q560）及《11Q 伪经诗篇》（11Q11），均强调避邪的方式，通过咒语、神圣祈祷及礼仪实践来抵御邪恶势力。这类传统与后期犹太教及基督教中出现的护身诗篇和祈祷文彼此呼应。相比之下，早期基督教文献，尤其是对观福音，将驱魔行为置于耶稣事工的核心位置。莫里斯指出，尽管早期犹太文献（包括库姆兰文本）更重视预防性抗魔实践，但它们同样将对抗邪灵的斗争纳入末世论框架之中。

在库姆兰传统与对观福音所展现的神学框架中，魔鬼的最终失败均被视为上帝末世性干预的成果。这一共同理解显示出，无论在库姆兰还是在早期基督教传统中，邪恶都被看作是一个既属当下现实、又具有末世维度的问题。库姆兰文献所强调的，是通过礼仪性手段——包括祈祷与咒语——来抵御魔鬼势力，并将最终胜利寄望于未来神圣的介入。而对观福音则描绘耶稣通过驱魔行动，已在现世中预示并启动了这种末世性的胜利，即上帝对邪灵的决定性胜出。尽管两种传统在应对方式上有所差异——一侧更注重预防与象征抵御，另一侧则强调直接驱逐与属灵权柄的实际彰显——但两者的终极盼望都依赖于上帝的主动介入。无论是通过礼仪性抗魔实践，还是借助神子在现实中驱逐魔鬼势力，这些传统的并置凸显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与早期基

道教在理解与应对邪恶（尤其是魔鬼侵扰）问题上的神学连续性与多样实践。这种复杂的互动不仅揭示了两者在观念上的共通性，也呈现了它们在宗教行为上的差异路径。

文本传承与互文性

关于库姆兰文献与对观福音的研究，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库姆兰的文本证据能够为我们理解对观传统的文本传承方式提供启示。特别是，斯图肯布鲁克（Stuckenbruck, 2014; 2010）对死海地区发现的文本流动性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分析其成书、修订与汇编的方式，并指出这些过程与对观福音的发展路径存在相似之处。他有力地论证道，库姆兰材料中的文本差异——例如增添圣经引文、措辞更动、省略、插入以及重组——与对观传统中呈现的文本差异相呼应。他的研究对传统学界重构“原始文本”的研究取向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库姆兰文献与对观传统实际上都经历了更为复杂且流动性更强的传承过程。这一视角引发了对“文本依赖模型”（literary dependence models）确定性的质疑，并强调在研究早期犹太与基督教文本时，需正视文本持续适应与修订的现象。最终，借助库姆兰材料，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早期犹太与基督教文本是在动态的诠释共同体中逐步演变而成的。

早期基督教的圣经诠释形成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释经传统的更广阔语境之中。在该传统中，圣经经文被不断重读，以回应不断演变的神学议题和群体关切。死海古卷，尤其是其中的佩舍尔释经（*pesharim*，即诠释性注释），提供了关于圣经如何在当代事件背景下被持续重新诠释的宝贵见解。多位学者已指出，库姆兰的释经方法与对观福音书中的释经实践，尤其是在“应验释经”（fulfilment hermeneutics）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例如，《马太福音》明确采用“应验”公式，将耶稣的生平与圣经预言相连接；而库姆兰文献亦通过引用圣经文本来验证当下现实，尽管其方式并不依赖类似的明示性公式（Stuckenbruck 2010, 141–144）。斯图肯布鲁克进一步分析了两个传统如何将释经权威归属于一位中心人物：在福音书中是耶稣，而在库姆兰群体中则是“正义之师”（Teacher of Righteousness）。然而，与福音书作者不同的是，库姆兰的释经者并不总是将其诠释明确归因于某位特定个体。在这两个传统中，圣经释经不仅仅是智识性或文学性的活动，更是一种塑造群体身份与末世期待的权威性行为。弗雷（Frey）指出，库姆兰出土的圣经手稿所展现出的文本流动性，反映出一种开放而具适应性的释经态度；相较之下，早期基督教更倾向于承袭固定的释经传统，而非直接引用具有变动性的圣经文本（Frey 2019, 403–428）。

八福

4Q 八福文献（4Q525）的发现对于理解《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八福”（Beatitudes）提供了重要的犹太教背景，揭示了智慧传统与末世论在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中的交汇点。该库姆兰文本包含一系列“祝福语”（*macarisms*，即祝福公式），其形式和功能与耶稣的八福高度相似，引发了关于文本连续性、影响路径以及共享传统的诸多讨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探讨 4Q525，以阐明对观福音中八福的性质。

布鲁克（Brooke）指出，尽管《马太福音》中的八福常被视为末世性的宣告，但其内容与犹太智慧传统（尤其体现在 4Q525 中）密切契合。他认为，这两部文本都鼓励一种道德生活方式，期待神圣祝福的临到；而其相似的“8+1”结构则共同强化了一种神学框架，即义人是那些寻求智慧并在试炼中持守的人。相比之下，丹尼尔·戴利（Daniel Daley, 2021, 第 158–215 页）则强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八福虽然在概念上都与 4Q525 有关联，但它们在犹太思想中侧重的面向有所不同。他认为，《马太福音》的八福反映了一种以智慧为导向的取向，着重于道德形成和门徒训练；而《路加福音》的八福则更体现出末世逆转（*eschatological reversal*）和社会经济关怀的主题。戴利还进一步探讨了《马太福音》中希腊词 *μακάριος*（*macarios*，“有福

的”)的含义,指出这一术语不仅传达神圣恩惠的概念,也表达了一种通过伦理生活实现人类繁荣的理念。这一点与 4Q525 所强调的“智慧之道”作为通往产业与神圣奖赏之路的思想相契合。综上,这些研究表明,4Q525 作为一个关键的对比文本,仍持续在学界引发关注。无论是从智慧劝诫(《马太福音》)、末世应许(《路加福音》),还是从早期犹太教中智慧与启示传统的互动角度来看,4Q525 都在理解八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结:对观福音与库姆兰文献在智慧传统、哈拉卡(halakhah)诠释、末世期待和宗派认同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交集。对观福音不仅强调耶稣如何重新诠释犹太律法与洁净规定,也体现出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关于群体归属与神圣启示的更广泛关切。这些主题在《约翰福音》中得以延续,但其神学重心有所不同。《约翰福音》呈现出更为成熟的二元对立(dualism)结构,更加强调神在创造中的主动作为,并对耶稣身份作出深具神学意味的诠释。这些特征使得《约翰福音》常被学者与库姆兰的“雅哈德”(Yahad)文献相比较,尤其是在其二元宇宙观、独特的启示观以及群体神学等方面。

4.2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与库姆兰第 1 洞窟出土的古卷在研究初期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米勒·伯罗斯(Millar Burrows, 1955)和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 1955)就已识别出《约翰福音》与库姆兰文献之间的若干主题重合,此后数十年中,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相关研究。

这些主题包括:

- 创造与神圣逻各斯——两种传统均强调宇宙论议题与上帝在创造中的主动性。
- 二元论——《约翰福音》的二元对立结构(光与暗、真理与谎言)与《双灵训诲》(1QS 3:13–4:26)中所体现的神学观念存在相似性;查尔斯沃思(Charlesworth, 1968–1969)曾列举出二者之间显著的概念平行。
- 弥赛亚观——两种传统所展现出的多样弥赛亚期待,暗示其可能共享某种启示文学的思想框架。
- 灵恩论(Pneumatology)——学界将《约翰福音》中“保惠师”(Paraclete)的概念与库姆兰文献中的“真理之灵”(Spirit of Truth)进行了比较研究。
- 群体动力学(Community dynamics)——“宗派性”与群体认同的建构在《约翰福音》与库姆兰文献中皆为核心议题。
- 圣经诠释——两者都采用了独特的释经方式,在解读经文时展现出深层的神学关注。

为解释上述主题上的诸多相似之处,部分学者曾推测施洗约翰或许曾是库姆兰社团的成员,从而间接影响了耶稣及其门徒。也有学者设想,可能有部分艾赛尼派(Essenes)成员后来转而成为耶稣的追随者,并由此对《约翰福音》中的二元论与灵恩论产生了塑造性影响。然而,在《约翰福音》与库姆兰关系的研究历程中,多位学者持审慎立场,指出尽管存在若干相似之处,但这些共同点更可能源自普遍的犹太思想传统,而非直接的历史传承关系。尽管关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关联仍引发持续兴趣,近年来学术讨论的重心已逐渐转向探讨《约翰福音》与库姆兰在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及希腊化思想背景下所共享的概念性与神学框架。

犹太教与希腊化思想

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对约翰研究的深远贡献极大地塑造了当代学界对《约翰福音》的理解,并挑战了早期学者将犹太教视为一元论、而希腊化思想视为二元论的截然划分。早期学者,尤其是在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 1941)影响下,倾向于从希腊化或诺斯替视角

解读《约翰福音》中的二元论结构及逻各斯（Logos）神学。这种解释认为，约翰的基督论，尤其是“我是”（I am）陈述和逻各斯意象（Logos motif），源自希腊哲学或诺斯替救赎神话（Gnostic Redeemer Myth）的思想框架。

然而，过去数十年来，学界越来越认识到《约翰福音》深厚的犹太根基，特别是在其对智慧传统与启示思想的承袭方面。布朗的研究重新调整了相关讨论的方向，指出《约翰福音》的二元论并非纯粹源自希腊思想，而是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广泛传统相呼应，包括库姆兰文献中所展现的“光与暗”概念。

近年来，保罗·安德森（Paul Anderson, 2011）等学者进一步强调《约翰福音》与犹太一神论之间的延续性，认为其逻各斯神学是从犹太教中“神圣代理”（agency motifs）的观念中发展而来，而非源自希腊宇宙论（Greek cosmology）。这一学术讨论的转向凸显了学界对《约翰福音》根植于犹太启示传统框架的日益认同。

启示论

《约翰福音》与犹太启示传统，尤其是库姆兰文献，存在若干关键的共通之处，然而在神圣启示的呈现方式上却进行了重新构建与调整。与库姆兰类似，《约翰福音》同样描绘天地之间的宇宙性分界，但雅哈德团体的末世论强调通过神圣中介（如“正义之师”或“天使般的人物”）传达启示，而《约翰福音》则将耶稣描绘为天启知识的唯一中保。《约翰福音》3:13 明确指出，唯有耶稣“升过天，又降下”，将其确立为上帝启示的独一无二权威。这一点与犹太启示文学中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通常通过异象经验，仅向少数特选者揭示天上的奥秘（Reynolds 2017）。

与此同时，《约翰福音》在概念层面与库姆兰出土的《自我荣耀诗歌》（4Q491c）亦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该诗歌中的发声者宣称自身拥有无与伦比的尊贵地位，与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关于其与天父之间独特关系以及共享神圣荣耀的陈述（参约 17:5, 22）相互呼应。两者皆未聚焦于末世历史终结的论述，而是共同强调通达天国的途径——即神圣智慧与荣耀的居所。《约翰福音》中的圣殿意象、高祭司语言以及序言中所展现的“逻各斯”神学（参约 1:1-18），与该诗歌中那位彰显神圣临在的尊崇人物形象高度一致。

由此可见，《约翰福音》并非彻底拒绝犹太启示传统，而是在吸纳其异象结构与神圣升格观的基础上，对启示经验进行了深刻的转化：库姆兰文献坚持神圣升天只属于被拣选的少数人，而《约翰福音》则以耶稣为启示的核心，向所有信徒敞开参与神圣荣耀的可能性。

二元论

学界长期以来就《约翰福音》与库姆兰社团二元论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讨论，代表性学者包括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约瑟夫·菲茨迈尔（Joseph Fitzmyer）、詹姆斯·查尔斯沃思（James Charlesworth）与哈罗德·阿特里奇（Harold Attridge），他们对此各持不同观点。布朗（Brown, 1955）指出，尽管《约翰福音》与库姆兰文献在启示论世界观和二元主题（如光明/黑暗、真理/虚假）上存在相似性，这些相似之处更可能源自第二圣殿时期更广泛的犹太教传统，而非直接的文本依赖。他强调，《约翰福音》的二元论相对不那么绝对化，其思想体系允许借由对基督的信仰而实现转变；相较之下，库姆兰社团则体现出更封闭、排他的宗派主义。菲茨迈尔（Fitzmyer, 1988）对此持更为怀疑的态度，认为约翰的二元论应理解为犹太与希腊文化交汇下广泛思想氛围的一部分。他强调，尽管约翰的二元语言在表达上与库姆兰有所重合，但更应将其置于更广义的犹太智慧传统与启示传统之中理解，而非简单归因于宗派思想。

阿特里奇（Attridge, 2009）则采取一种折衷立场，他在肯定《约翰福音》与库姆兰在主题上的相似之处的同时，指出二元母题是整个犹太启示文学中的普遍现象，并非库姆兰独有。同样，查尔斯沃思（Charlesworth, 2011）认为，《约翰福音》与库姆兰社团都可被视为在与主流犹太

社会的张力中发展出的宗派性运动 (sectarian movements)，但他进一步指出，死海古卷为理解约翰神学提供了重要的犹太教背景。尽管上述学者均不认为《约翰福音》直接借鉴了库姆兰文献，但他们一致认为，《约翰福音》与库姆兰共享一个概念世界——这个世界以末世期待、神圣启示与宇宙性的二元论为其核心特征。

邪恶与启示文学

约翰福音的启示框架与其关于宇宙性冲突的愿景密不可分，这一主题在库姆兰文献中也有明显体现。两者皆呈现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强烈二元对立，强调神圣启示是在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赐予的。雅哈德团体的文献着重描绘神如何保护选民，使其免受彼列 (Belial) 权势的侵扰；而约翰福音则将耶稣描绘为守护者，保护其门徒脱离“那恶者” (参约 17:15; Stuckenbruck 2011)。

然而，两者对于神圣介入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库姆兰社团期待神以末世性的拯救介入历史，并通过赐予团体隐藏的智慧而揭示真理；而约翰福音则将启示与保护两者都集中体现在耶稣自身之中。约翰团体虽同样意识到自身正处于与敌对势力的属灵争战中，但其回应方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相较于库姆兰社团对未来启示与拯救的等待，约翰团体在耶稣身上已然看见这两者的实现。耶稣的临在不仅传递了神圣知识，也确立了对邪恶最终胜利的应许

弥赛亚观

库姆兰社团与《约翰福音》对弥赛亚的期待呈现出一系列值得比较的异同。库姆兰文献中显现出两位弥赛亚人物，即祭司弥赛亚与大卫弥赛亚 (1QS 9:11; CD 12:23–13:1)。然而，库姆兰发现的文本所展现的弥赛亚观并非单一且固定的体系。一些文献预示着一位类似摩西的先知型人物 (如 1QS 9:11)，而另一些文本 (如 4Q246) 则描绘了一位带有神性意味的末世“神之子”形象。这种弥赛亚观的多样性表明，库姆兰社团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融合了多个犹太传统，而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弥赛亚期待。

这一点与《约翰福音》中的弥赛亚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约翰福音》集中呈现耶稣作为唯一的弥赛亚，不仅同时承担王权与祭司职分，而且其身份整合了先知、祭司与君王的多重角色，不再保留库姆兰传统中所见的功能区隔。查尔斯沃思 (Charlesworth, 2011) 指出，尽管《约翰福音》与库姆兰文献同样期待一位受膏者的出现，以实现洁净与新时代的开启，但《约翰福音》中的耶稣形象在整合三重身份方面具有独特性。他不仅是启示性的先知，还是大卫王裔与大祭司，其弥赛亚身份的复合性使其与库姆兰所描绘的弥赛亚形象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异。

在库姆兰传统中，祭司与大卫两类弥赛亚角色分工明确：

- 祭司弥赛亚主要执行礼仪和洁净的职能；
- 大卫弥赛亚则被期望带领末世战争，重建以色列的政治与军事主权。

相较之下，《约翰福音》呈现的耶稣集大祭司、大卫王与启示性先知于一身，其弥赛亚身份的整合不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更在性质上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神学构想。

水与灵

多位学者关注“洁净” (purification) 这一概念，因为它在《约翰福音》与库姆兰社团的仪式中均占据重要地位。这两个传统都将“身份认同” (identity) 与“洁净”紧密联系：库姆兰社团自视为被上帝拣选的“余民”，区别于更广泛的犹太群体；而《约翰福音》则将耶稣的追随者描绘为“属于真理”的人，与“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约 17:14–16)。

在礼仪洁净的实践中，库姆兰与《约翰福音》都高度重视水的象征意义，尽管在神学关注点上各有侧重。对于库姆兰社团而言，水的洁净不仅是仪式行为，更与灵性的更新以及对末世的准备紧密相关。《社团规则》明确指出，除非“真理之灵”洁净人的罪孽，仅凭水的洗礼无法实现真

正的洁净（1QS 3:6-9）。这一点表明，在库姆兰传统中，水并非洁净的最终手段，唯有神的介入才能完成真正的净化。

泰森（Thiessen, 2020）进一步指出，这种观念体现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更广泛的信仰结构：水作为洁净的媒介，虽具有预备功能，但惟有上帝的作为才能实现终极的洁净。同样地，《约翰福音》中所描绘的水洗也不仅是外在的洁净仪式，更是引向“灵中新生命”的前导行为（约 3:5）。正如哈林顿（Harrington, 2011, 124）所言：“唯有上帝的灵才能带来真正的更新，而水的仪式则预示并呈现这一恩赐。”

尽管两种传统在神学强调上存在差异，但都将水视为个体转化与群体归属的重要象征。水的礼仪在这两种宗教语境中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构成通往灵性洁净与身份重构的重要途径

宗派性（Sectarianism）

关于约翰团体是否具有“宗派性”仍是学术界持续争论的议题，尽管“宗派”这一术语本身存在一定的使用困境。与库姆兰社团类似，《约翰福音》描绘了一个自我认同为“内部群体”的集体，并与更广泛的世界形成对立。

盖尔·R·奥戴（Gail R. O'Day, 1996）将约翰神学中的排他性倾向与库姆兰社团对圣经“正统诠释”的强调进行比较，但她认为，约翰团体并不能被严格归类为宗派性群体。卡雷·西格瓦尔德·福格塞特（Kåre Sigvald Fuglseth, 2005）同样对将“宗派模型”（the sect model）套用于《约翰福音》提出批评，指出尽管该文本反映了明显的社会张力，但并未主张如库姆兰所体现的那种严格的退隐主义。

与库姆兰的分离主义立场不同，《约翰福音》中的耶稣被描绘为“世界的救主”（约 4:42），并差遣门徒“进入世界”履行宣教使命（约 17:18）。福格塞特还对两者在圣殿观上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库姆兰社团将自身视为真正的圣所，而《约翰福音》则表现出一种更为复杂乃至模棱两可的立场。

关于“宗派性”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化，学术界对库姆兰文献及“雅哈德”团体的社会结构的关注日益增加。近年来，学者们愈发意识到在历史研究中直接套用现代社会学模型所面临的方法论挑战，强调应充分考虑古代群体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同的复杂性。尽管约翰团体在某些方面确实表现出排他性特征，与库姆兰存在相似之处，但其与外部世界的持续互动使其难以被僵化地归入宗派主义范畴之中。

总结

关于《约翰福音》与死海古卷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早期犹太教与基督教思想的一幅复杂图景。二元对立、神圣启示、洁净观念以及群体身份认同是两者共同关注的核心主题，然而《约翰福音》在这些概念上的神学发展与诠释仍展现出其独有的特质。尽管“约翰团体”因在思想上与库姆兰的“雅哈德”团体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而被广泛讨论，但近年来的研究逐渐显示，这些相似性往往可归因于当时更广泛的文化氛围，尤其是犹太启示传统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福音》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尤以其对基督论的强调以及对圣灵在引导与维系信徒群体中的作用的理理解，体现出其独到的神学视角。

4.3 保罗书信研究

自死海古卷问世以来，保罗与库姆兰社群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在术语运用与神学理念的相似性方面。早期研究多致力于在库姆兰宗教文本与保罗神学之间寻求直接的对应关系，重点探讨如二元论、“恩约守法主义”（covenantal nomism，或译作“圣约律法主义”）以及末世论等主题（Murphy-O'Connor 1968）。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趋向于超越单纯的相似性比

对，而将二者置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更为广阔的思想图景之中，强调它们共同参与了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犹太思想网络（Lim 2003, 135–56；Rey 2014, ix–xvi）。

律法问题

E. P. 桑德斯（E. P. Sanders）于 1977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深刻地重塑了保罗与第二圣殿时期律法传统之间关系的学术讨论。他质疑早期学界普遍将犹太教描绘为律法主义的传统看法，转而提出“恩约守法主义”概念，指出遵行律法并非为了获取义，而是在上帝恩典的框架下进行的信仰回应。尽管其研究主要聚焦于如《社团规则》（1QS）与《大马士革文献》（CD）等第一洞古卷文献，桑德斯的总体论断却对保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保罗与库姆兰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之一是《妥拉行为规约摘录》（4QMMT, Miqsat Ma'ase ha-Torah）。该文本中出现了“律法之工”（ma'ase ha-Torah）一语，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中论辩的核心术语之一（希腊语 ἔργων νόμου, “works of the law”）。马丁·阿贝格（Martin Abegg, 1994 年）最早指出了这一定义上的语言联系，并提出，4QMMT 中的“律法之工”应理解为特定的哈拉卡规条（halakhic rulings），而非对整部摩西律法的普遍遵守。这一观点支持了如下解读：保罗在《加拉太书》2 章 16 节和《罗马书》3 章 20 节中的论战，并非全面否定犹太律法本身，而是针对某些特定关于律法的解释，特别是与圣约身份界定相关的理解。

卢茨·多林（Lutz Doering, 2014）进一步指出，虽然 4QMMT 强调遵行律法是进入圣约群体的必要条件，但保罗则重新定义了“义”的概念，即义是通过对基督的信仰而非律法行为所获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保罗完全否弃犹太律法，而是重新定位律法在圣约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犹太教内部的保罗”（Paul within Judaism）研究路径进一步指出，保罗对“信心”与“律法之工”（ἔργων νόμου, *erga nomou*）的对立，常常在传统解读中被误读为对律法的根本反对。实际上，保罗并非反对犹太人遵守妥拉，而是拒绝将外邦人皈依犹太教——尤其是接受割礼——作为他们加入圣约群体的前提。这一解读强调，保罗所批评的，并非犹太律法主义本身，而是将种族界限标志（ethnic boundary markers）强加于外邦信徒的做法。他主张，圣约身份的确立应当以对基督的信心为基础，而非倚赖民族认同的外在表现。

保罗对犹太律法的探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反映了早期犹太教内部围绕律法、身份与称义等议题的更广泛辩论。库姆兰文献，特别是《4QMMT》，为理解保罗如何参与这一思想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视角。通过考察这些文本，学界能够更深入地把握保罗在律法与信仰、族群认同与圣约归属之间展开的神学论述。

洁净观

库姆兰社团与保罗所代表的基督信仰均对“洁净”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藉此重塑其群体认同与界限。迈克尔·牛顿（Michael Newton, 1985）指出，尽管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双方都将自身视为耶路撒冷圣殿的替代者，并据此调整了洁净规条。库姆兰社团自认为是一个已被洁净的圣殿，强调群体的分别性、沐浴洁净仪式（如浸礼），以及严格的成员资格要求，以维系其圣洁状态。相比之下，保罗则将“洁净”从礼仪层面转向伦理层面，赋予其道德意义。他将基督徒群体界定为上帝的新圣殿（参见林前 3:16–17；6:14–7:1；罗 12:1–2, 15:16），在这一神学架构中，信徒自身成为献给上帝的活祭；群体的圣洁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洁净律法，而是通过道德纯洁得以维系。

灵与肉

保罗书信中“灵”（πνεῦμα, pneuma）与“肉”（σάρξ, sarx）的对立，长期以来被学者用于与库姆兰文献中的人类观进行比较，尤以《社团规则》（1QS）、《感恩诗篇》（1QHa）和《4Q 训诲》（4QInstruction）为代表。学界的争论焦点在于：保罗关于“灵”与“肉”的对立是否与库姆兰文献中体现的决定论式二元论（deterministic dualism）相契合，抑或更应视为延续了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更广泛的智慧传统与启示型末世论思想。

约格·弗雷（Jörg Frey）对《双灵训诫》的解读

弗雷特别关注《社团规则》（Community Rule）中 1QS 3:13–4:26 的“《双灵训诫》”（Treatise of the Two Spirits）段落，该段将人类划分为受“真理之灵”引导者与受“悖逆之灵”操控者两类。在 1QS 中，这一二元区分自创世之初便已确立，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定比例的两种灵，从而决定其生命的走向与命运。弗雷认为，这种二元论框架为保罗的人类观提供了思想背景；但他进一步指出，保罗对该结构进行了末世性的重构，将其转化为一个参与性的、持续展开的过程。与 1QS 中严格而静态的划分不同，保罗所描绘的“转化”是借由圣灵（Spirit）所实现的持续性、动态性的改变（Frey 2022, 153–194）。

马修·戈夫（Matthew Goff）对《4Q 训诲》的诠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戈夫将研究焦点置于《4Q 训诲》（4QInstruction），其中同样区分了“属灵之人”（spiritual people）与“属肉之灵的人”（people of fleshly spirit）。尽管这种二分结构表面上与《社团规则》的决定论框架相似，戈夫却指出，《4Q 训诲》中的区分更具认知性（epistemological），而非本体性（ontological）。换言之，该文本所描绘的人类差异并非源于其存有上的本质不同，而在于是否获得了神圣智慧的启示。

“属灵之人”是指那些被赋予了神秘启示、尤其是对“存在之奥秘”（*raz nihyeh*，意为“将要发生之奥秘”或“存在的奥秘”）有所领悟之人；而“属肉之灵的人”则指那些从未获得此类启示的人群。这种区分不是与生俱来的命定身份，而是基于人所拥有的知识与认知状态所产生的功能性划分。戈夫将这种区分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3 章与第 15 章中关于“属灵的”（πνευματικός, *pneumatikos*）与“属肉的”（σαρκινός, *sarkinos*）之区分相比较，认为保罗同样是依据信徒对神圣智慧的理解程度加以区分，而非基于某种预设的人类类别。

然而，戈夫并不主张《4Q 训诲》对保罗构成了直接影响；他更倾向于认为，两者分别体现了犹太思想传统中对智慧与末世论主题的广泛探索（Goff 2011）。

沃德铭（Benjamin Wold）对《4Q 训诲》的解读

与戈夫（Matthew Goff）相比，沃德铭提出了一种更具动态性的人类观。他认为，《4Q 训诲》（4QInstruction）中被称为“属肉之灵的人”，最初曾拥有神圣智慧，但因道德的堕落或对启示的忽视而逐渐丧失了这一智慧（Wold 2022, 178–191）。在这一理解框架下，该文本与《罗马书》1:21 存在某种概念上的契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 戈夫将《4Q 训诲》中的人类划分理解为静态的，即一部分人拥有启示，另一部分人则没有。
- 沃德铭则主张，神圣智慧的获得与丧失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意味着人类可能因自身选择而逐渐脱离神圣启示。

这一观点使得《4Q 训诲》在人类责任的理解上更贴近保罗的神学视角，因为它强调了人类在道德和认知层面上逐步堕落的可能性，而非生来就被划分为不同的固定类别。因此，沃德铭批判将该文本解释为严格决定论（deterministic）的立场，认为其更准确的描绘应是人类在智慧与德性方面不断衰退的过程，而非一种不可逆转的二元划分。

保罗思想与库姆兰传统的对比分析

上述不同学者的解读凸显了库姆兰文献中“灵”与“肉”的区分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其与保罗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的神学关联：

弗雷（Frey）认为，《社团规则》（1QS）中二元论的人类观带有决定论特征，但保罗对其进行了末世性的重构，将其转化为信徒参与式的生命转变过程。

戈夫（Goff）认为，《4Q 训诲》的划分虽具等级性，但本质上是认知性的（epistemological），强调的是对神圣智慧的领悟，而非出于人类本质的区别。

沃德铭（Wold）则主张，《4Q 训诲》容许神圣启示在时间中的丧失，从而使其更为接近保罗关于人类转化与堕落的理解，强调人类责任与自由意志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库姆兰传统与保罗人类观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仍有争议，这些文本却共同探讨了诸如神圣智慧的启示、人类差异的来源，以及末世论的进程等关键主题，显示出它们在更广泛犹太思想语境中的深层神学共鸣。

时间观的探讨

时间的问题，尤其是与末世相关的紧张关系（eschatological tensions），在《保罗书信》与《库姆兰文献》的研究中引起了广泛关注。洛伦·斯塔肯布鲁克（Loren Stuckenbruck, 2014, 309–326）考察了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即保罗的神学建立在一种刚性化的“两个时代”结构之上（two-age framework），其中“现今时代”先于即将到来的“末世时代”。

确实，许多著名的保罗诠释者，如恩斯特·凯瑟曼（Ernst Käsemann）和詹姆斯·D·G·邓恩（James D. G. Dunn），都强调保罗的时间观与犹太传统的末世论之间存在激进的断裂。然而，斯塔肯布鲁克认为，这一断裂性的说法被过度夸大了。

相反，他主张，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文献——尤其是库姆兰文本——已经包含某种“时间交叠”（temporal overlap）的概念，这一思想内核与保罗神学存在重要共鸣。基于此观察，斯塔肯布鲁克对传统假设提出质疑，强调保罗的时间观更具流动性（fluidity），呈现出一种时间的交错与过渡状态。

在保罗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了犹太启示传统，也对其进行了重塑。特别是，基督的复活被视为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新世界的突破（*inbreaking*），但与此同时，旧世界的秩序仍在延续。库姆兰文献为保罗的时间观提供了更广阔的犹太思想背景，使我们意识到，保罗并非与犹太末世观发生彻底断裂，而是在其中进行深化、重构与再诠释。

总结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保罗与库姆兰之间共享的诠释传统，而非追求二者之间直接的文本依赖关系。研究者们不再仅仅寻找零散的相似之处，而是强调这两套文献如何体现了更广泛的第二圣殿时期犹太释经实践（George Brooke 2014; Timothy Lim 1997）。

这种研究取向凸显出保罗书信与库姆兰文本在若干关键方面的共同点，包括：

相似的释经方法：两者都将先知书加以重新诠释，以回应其所处的历史与宗教处境；

创造性地运用圣经互文性（biblical intertextuality）；

通过对经文的重新构建（scriptural reconfiguration）来界定群体身份，尤其是在圣约身份（covenant identity）的理解上。

这种犹太圣经诠释的流动性 (fluidity) 体现在: 保罗与库姆兰社群虽同样从一个共同的传统资源库中汲取灵感, 却最终发展出彼此迥异的神学结论。

这一视角将保罗与库姆兰置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犹太诠释文化之中, 既确认他们在文本文化中的共同参与, 也承认他们在思想体系上的重大分歧。

4.4 希伯来书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日益重视库姆兰文献对《希伯来书》神学架构的影响, 尤以末世论、祭司职分与赎罪观为甚。许多死海古卷展现出一种启示性的世界观, 期待受造界的更新与转变, 这与《希伯来书》从旧约到新约的转变及其末世性产业的观念相互呼应。例如:

《安息日献祭之歌》(Songs of the Sabbath Sacrifice) 描绘了一种高度发展的天使祭司体系, 可能为《希伯来书》中耶稣作为“天上大祭司”的形象提供了背景依据。

库姆兰关于罪、污秽与末世洁净的理解, 与《希伯来书》中基督在天上圣所献祭以成就赎罪的观念存在相似之处。

这些主题表明, 库姆兰文献与《希伯来书》共享相似的神学氛围, 但这类关联更可能源自第二圣殿时期共同的犹太宗教背景, 而非直接的文本依赖。大卫·莫菲特 (David Moffitt, 2011) 在该领域的研究尤具代表性, 他指出, 无论是《希伯来书》还是库姆兰文献, 都将神圣旨意的实现归因于一位被高举的祭司性人物, 此人物充当天地之间的中保。

4.5 《雅各书》

学者们长期以来对《雅各书》的文学分类以及其思想与文化背景展开了广泛讨论。与库姆兰文献的比较有助于将《雅各书》置于早期犹太智慧传统的发展脉络之中。与《4Q 训诲》(4QInstruction) 相似, 《雅各书》将智慧主题与启示性的末世论结合起来, 展现出一个涵盖宇宙观、末世观与伦理实践的整合性世界观 (Hartin 2005; Wold 2022)。其末世愿景进一步与库姆兰的智慧传统相契合, 在这两者的思想体系中, 神圣审判与宇宙秩序均处于核心位置 (Lockett 2005)。虽然《雅各书》传统上被归类为智慧文本或启示性的劝勉书信, 但如《4Q 训诲》所揭示, 在早期犹太思想中, 智慧文学与启示文学之间的界限并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泾渭分明。在《雅各书》中, 智慧具有面向未来的维度, 即伦理行为具有末世性的后果。从库姆兰智慧传统的视角出发, 可以重新界定《雅各书》在早期犹太教与基督教思想谱系中的位置, 并揭示其如何参与当时更广泛的神学与伦理讨论。

《雅各书》与库姆兰智慧文学的一个核心特征, 是智慧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雅各书》中, 智慧不仅仅是认知性的观念, 而是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这与犹太智慧传统中“手的智慧” (hokmat ha-yad) 的观念相呼应, 强调智慧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践行。此一视角重新诠释了《雅各书》中“行道者” (雅 1:22) 的劝勉, 使其不再被视为对保罗神学的对立, 而是作为犹太智慧传统的一种延续, 即智慧与行为本不可分割。

《雅各书》中关于贫富的论述, 也可以通过与《4Q 训诲》的比较获得新的理解。在后者中, 贫穷既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实, 也是一种神学建构 (Tiller 2005)。这种视角挑战了那些将《雅各书》的经济语言简单视为字面或隐喻的解释。同样地, 《雅各书》中对妥拉的承接也可在库姆兰智慧文本中找到呼应。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雅各书》要么将妥拉从属化于智慧传统, 要么将其与耶稣的教导等同, 但《雅各书》与《4Q 训诲》共同体现一种犹太内部的论述传统, 其中智慧具有普遍性, 而妥拉依然具有权威性, 只是其诠释已经被纳入不断演化的智慧传统之中。

因此, 《雅各书》并非位于智慧传统的边缘, 也并非纯粹的基督教重释, 而是属于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智慧论述的更广泛潮流, 反映了它对当时正处于变动中的犹太传统所作的动态回应与参与。

4.6 《约翰启示录》

库姆兰《战卷》（1QM）与《启示录》在末世战争的描绘上具有重要的主题与文学关联。两者都展现了善与恶势力之间的最终决战，然而，《启示录》对神圣战争的传统意象进行了转化，使其有别于《战卷》所描绘的军事化愿景。

当前有关这两部作品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暴力意象的转化 ——《战卷》呈现的是一场地上的战争，由“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之间展开的军事对抗；相比之下，《启示录》重塑了末世战争的图景，强调羔羊所成就的救赎性胜利，而非军事征服。
2. 礼仪与祭司元素的角色 ——两部作品都描绘神圣存在（天使）参与战争，并且将天使的争战与天上的敬拜及神圣仪式相互交织在一起。
3. 圣经文本的重新诠释 ——《战卷》和《启示录》都创造性地运用先知文学（尤其是《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来建构神圣正义的图景。两者都采用象征性称谓来指涉帝国压迫者（如《启示录》将罗马称为“巴比伦”；《战卷》则以“基提族”（Kittim）指代敌对势力）。
4. 启示性的世界观 ——两部作品都将历史描绘为通向神最终介入的过程，但《战卷》展现出更为决定论的取向，强调命运的预定性；相较之下，《启示录》则更突出道德抉择与人类责任的主体。

此外，学者们也进一步探讨了关于神圣审判与复兴的主题，尤其是“新耶路撒冷”的意象，以及这两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末世盼望。

末世战争与暴力意象

在《战卷》（1QM）与《启示录》的比较研究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是暴力意象与象征性重释之间的互动关系。学者普遍认为，约翰的异象代表了对犹太启示性战争传统的一种神学性转化。理查德·包克姆（Richard Bauckham, 1998）指出，《启示录》对末世战争意象进行了重塑，与《战卷》中所描绘的“神所命定的军事冲突”形成鲜明对比：

- 《战卷》描绘的是一场由神主导的军事战争，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展开实质性的武装对抗。
- 相较之下，《启示录》则重新定义了战争的本质，将其呈现为信徒在忠诚见证与顺服神圣主权中展开的属灵争战。

《启示录》并未简单否定《战卷》（1QM）中的战争传统，而是保留了其军事语言，但对其意义进行了重新配置：

- 基督的胜利，不是借由武力征服，而是通过牺牲性的死亡成就的；
- 基督的追随者，也不是战士，而是殉道者——他们通过忍耐与忠诚见证来得胜。

大卫·奥内（David E. Aune, 1999）也对两部作品共享的启示性主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尽管《启示录》确实借用了犹太战争的意象，约翰却并不仅仅是“转化”了这些传统，而是在一个“先知性”且“以基督为中心”的框架中重新塑造了它们。

洛伦·约翰斯（Loren L. Johns, 2006）进一步指出，《启示录》颠覆了 1QM 所代表的军事期待，通过重新定义末世战争的图景，突出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性胜利。

近年来的研究对《战卷》（1QM）描绘的是一场“真实战争”这一长期假设提出了挑战，而这—假设曾被视为《战卷》与《启示录》比较研究的基础。亚历克斯·贾森（Alex P. Jassen, 2015）指出，《战卷》所构建的并非是对未来战争的具体预期，而是一种“暴力意象”（violent imaginaries）——即对危机的感知性反映，而非战争计划的蓝图。

这种重新评估促使学界以更为细腻的方式重新审视《战卷》与《启示录》的比较，因为二者都融合了末世冲突、象征性表达和神学意涵，超越了对单纯军事对抗的理解。

在《战卷》与《启示录》中，末世战争与敬拜及神圣干预之间的交汇构成了核心主题。这两部作品都描绘了天使的参与，以此强调战争的宇宙性规模。例如：

在《战卷》中，米迦勒率领天军出战（1QM 17:6-8）；

在《启示录》中，米迦勒与撒但及其军队在天上争战（启 12:7-9）。

这类描绘表明，末世战争并不仅限于地上的军事冲突，更涉及神圣领域的对抗。

此外，战争本身也具有礼仪性的维度：诗歌与祷告不仅作为敬拜的表达形式，也在战争中发挥“武器”的作用，借由人类与天使的联合赞美，使万有对齐于神圣秩序（1QM 12:1-9；启 4-5，19:1-8）。

在战争中，祭司职能发挥关键作用：《战卷》规定，祭司在战斗之前必须执行祝福仪式，并穿戴圣衣，以确保神圣秩序的维系（1QM 15:1-5）；类似地，《启示录》描绘了在天上祭坛前的献祭场景，圣徒的祷告如香升至神面前，引发神的回应性干预（启 8:3-5）。

这种礼仪与战争的融合显示：末世战争的胜利不单依赖军事行动，而是通过神圣秩序的确立与执行来实现的。战争的最终胜负取决于神的主权，而这一主权透过礼仪行为与祭司职能而具体展现。此外，两部作品都体现出对礼仪纯洁与神圣秩序的高度重视。《启示录》强调信徒通过羔羊之血而得洁净（启 7:14），突显属灵洁净在参与神圣秩序中的必要性；

《战卷》则要求军营中的洁净必须得到维护，不洁之物与不洁之人需被排除，以确保神的同在与胜利（1QM 7:3-6）。这种对礼仪纯净的强调进一步说明，末世战争并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是一场关乎神圣秩序与属灵权柄的争战。

此外，两部作品都体现出对礼仪纯洁与神圣秩序的高度重视。《启示录》强调信徒通过羔羊之血而得洁净（启 7:14），突显属灵洁净在参与神圣秩序中的必要性；《战卷》则要求军营中的洁净必须得到维护，不洁之物与不洁之人需被排除，以确保神的同在与胜利（1QM 7:3-6）。这种对礼仪纯净的强调进一步说明，末世战争并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更是一场关乎神圣秩序与属灵权柄的争战。

综上所述，《战卷》与《启示录》所描绘的末世战争远不止军事层面的对抗。在这两部作品中，真正决定胜负的并非武力本身，而是对属灵权柄的顺服与确立。这场战争不仅是天地之间的较量，更是通过敬拜、礼仪洁净与祭司职能所展开的神学进程。

最终审判与复兴是《战卷》（1QM）与《启示录》中末世战争叙事的重要主题。阿黛拉·亚布罗·柯林斯（Adela Yarbro Collins, 2006）在其研究中系统探讨了库姆兰文献中关于理想化或更新之耶路撒冷的观念，并分析了这些传统与《启示录》之间的关系。《战卷》描绘了一场由上帝所预定的终极战争，其中“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展开宇宙性的对抗，而耶路撒冷在这一末世冲突中占据核心地位。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被视为确立上帝统治的必要前提。

尽管《战卷》并未如 4Q554（柯林斯研究的主要对象）那样呈现一个完整而具体的“新耶路撒冷”异象，但文本显然预设了一座被洁净且受到上帝保护的耶路撒冷，作为末世战争结束后上帝子民的立足之地。柯林斯将《战卷》与其他描绘新耶路撒冷的库姆兰文献加以对比，指出《战卷》侧重于战争与上帝在末世历史中的直接干预，而其他文本则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城市更新图景，包括建筑性的描写或带有乐园意象的复兴构想。

彼得·弗林特（Peter Flint, 2002）进一步探讨了《启示录》、《战卷》与新耶路撒冷文本之间的关联，强调它们在意象和神学世界观上的相似性。

《战卷》和《启示录》都预示上帝将亲自干预，推翻压迫势力，恢复神圣秩序。然而，两者对“新耶路撒冷”的描绘存在关键差异。《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末世性的完全实现的城

市，从天而降，象征上帝最终应许的成就（参启 21:1-4：“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相比之下，《战卷》中的耶路撒冷复兴则更具功能性而非异象性；它被呈现为末世战争胜利后上帝子民的堡垒，而非一个降临的天上之城。

《战卷》（1QM）与《启示录》同样将末世审判描绘为历史进程中的高潮性时刻，但二者在叙述重点上呈现出不同取向。《启示录》将上帝的终极审判描写为“巴比伦”（象征罗马）的毁灭、忠信者的复活，以及新耶路撒冷的建立（启 18-22）。相比之下，《战卷》主要通过“黑暗之子”的彻底毁灭来框定神圣审判的内涵。《战卷》设想了一段预定的冲突时期，并以上帝的直接介入作为高潮，这一点与《启示录》中对世俗权势在末世中遭遇覆灭的描绘形成呼应。

尽管两部文本都预期上帝对敌对势力施行报应，《启示录》却将这一审判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宇宙更新图景之中，而《战卷》的关注重点则集中于邪恶势力的即时败亡以及上帝所拣选之群体的最终昭雪，相较之下，对新世界秩序的整体描绘则较为有限。

圣经重释与帝国压迫

《战卷》（1QM）与《启示录》都通过对圣经传统的重释，将既有的预言性文本重新纳入其末世论愿景之中，尤其体现在对帝国敌人的隐秘性指称上。《战卷》将“基提族”（Kittim）——这一原本用于指称远方外邦势力的术语（参民 24:24；赛 23:1）——重新界定为罗马，并将其塑造成由上帝所预定之末世战争中的终极对手。与此相似，《启示录》以“巴比伦”作为罗马的隐语，借助耶利米书 50-51 章关于巴比伦覆灭的预言，描绘罗马即将到来的毁灭。通过这些编码化的指称方式，两部文本共同体现出一种先知性重释的传统，即在延续既有经文意象的同时，使之适应并回应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现实与帝国压迫处境。

此外，这两部作品都展现出对数字象征，尤其是“七”的重要性的浓厚兴趣，从而将其末世愿景与更广泛的圣经传统联系起来（如创世的七日周期、出埃及时缩短的灾难、以及耶利哥围城的七日）。《启示录》将上帝的审判结构化为七印、七号、七碗的连续模式，体现出这一象征性结构。《战卷》则通过对战争持续时间的计算，呼应了圣经中神圣行动在固定时间框架内展开的先例。

通过这些文本互涉策略（intertextual strategies），《战卷》与《启示录》皆以圣经为神学框架，用以展望上帝的公义得以实现的未来图景。尽管《启示录》在其释经实践中扩展至宇宙的更新与最后的审判，而《战卷》则主要聚焦于即将来临的末世战争，二者皆体现出晚期第二圣殿时期犹太释经传统的特点——在这一传统中，过去的预言不断被重新置入当下语境，以应对现实或感知中的危机。这种诠释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上帝将最终干预历史、施行决定性审判的持续期待。

5. 结论

在过去三十年中，关于死海古卷与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已逐渐摆脱“直接影响”这一简化模型，转而发展出对第二圣殿时期所共享的宗教话语、社会形态与释经传统的更为细致的理解。近年来的研究指出，早期基督教与库姆兰运动皆起源于犹太教内部更广泛的辩论氛围。库姆兰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学界对晚期第二圣殿时期犹太宗教多样性的认识，并为我们理解早期基督教所诞生的思想与神学背景提供了宝贵而不可替代的洞见。

展望未来，关于库姆兰与早期基督教的研究仍在不断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近年来，学界对“文本流动性”的日益关注——即圣经及次圣经传统在动态传承与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已经开始重塑我们对死海古卷与早期基督教文献的理解。然而，就整体而言，早期基督教研究尚未充分整合库姆兰研究所揭示的深远意涵。尽管若干主题已得到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在直接比较的框架下，仍有诸多层面有待深入探究。因此，下一阶段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文学与神学层面的交汇，还应进一步关注这些群体在具体历史处境中所体现的宗教生活经验。

综上所述，死海古卷为理解晚期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思想的多样性提供了一扇无可替代的窗口。围绕这些文献的研究，仍然是把握塑造早期基督教兴起之历史与思想条件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一多元而动态的犹太传统语境中，早期基督教得以形成并发展其独特的宗教表达。展望未来，最具启发性的研究路径，将是那些既充分尊重犹太传统内部的复杂性，又认真对待早期基督教创新之独特性的研究取向。唯有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对话，方能促成对这一关键历史时刻更加丰富而整合的理解。

6. 参考书 (Bibliography)

Abegg, Martin G. and Ben Zion Wacholder. *A Preliminary Edition of the Unpublished Dead Sea Scrolls: The Hebrew and Aramaic Texts from Cave Four* (Washington D.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5).

Abegg, Martin G., "Paul, 'Works of the Law,' and MMT," *BAR* 20.6 (1994): 52–55.

Allegro, John, *The Sacred Mushroom and the Cross: A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within the Fertility Cult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Anderson, Paul N., "John and Qumran: 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over Sixty Years," in *John,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ed. Mary L. Coloe and Tom Thatcher (Atlanta, GA: SBL, 2011), 15–50.

Attridge, Harold W., "The Gospel of Joh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Text,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Qumran and Early Christianity*, ed. Ruth A. Clements and Daniel R. Schwartz, *STDJ* 84 (Leiden: Brill, 2009), 109–126.

Aune, David E., "Qumran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fter Fifty Years*, ed. James C. VanderKam and Peter W. Flint, vol. 2 (Leiden: Brill, 1999), 622–48.

Bauckham, Richard, *The Climax of Prophecy: Studies 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8), 210–237.

Brooke, George J., "2 Corinthians 6:14–7:1 Again: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Pauline Literature*, ed. Jean Sébastien Rey (Leiden: Brill, 2014), 1–16.

Brooke, George J.,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New Testament: Essays in Mutual Illumination*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2005).

Brown, Raymond E., "The Qumran Scrolls and the Johannine Gospel and Epistles," *CBQ* 17 (1955): 403–19.

Bultmann, Rudolf, *Das Evangelium des Johann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41).

Burrows, Millar, *The Dead Sea Scrolls* (New York, NY: Viking Press, 1955), 326–348.

Capper, Brian, “‘With the Oldest Monks...’: Light from Essene History on the Career of the Beloved Disciple?” *JTS* 49 (1998): 1–55.

Capper, Brian, “The Palestinian Cultural Context of Earliest Christian Community of Goods,” in *The Book of Acts in its Palestinian Setting, vol. 4 of The Book of Acts in Its First Century Setting*, ed. Richard Bauckham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5), 323–56.

Charlesworth, James H. “The Fourth Evangelist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Assessing Trends over Nearly Sixty Years,” in *John,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ed. Mary L. Coloe and Tom Thatcher (Atlanta, GA: SBL, 2011), 161–182.

Charlesworth, James H. “The Priority of John? Reflections on the Essenes and the First Edition of John,” in *Für und wider die Priorität des Johannesevangeliums*, ed. Peter L. Hofrichter, TTS 9 (Hildesheim: Georg Olms, 2002), 73–114.

Charlesworth, James H.,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the Dualism in 1QS 3:13–4:26 and the ‘Dualism’ Contained in the Gospel of John,” *NTS* 15 (1968–1969): 389–418

Collins, John J. *The Scepter and the Star: Messianism in Light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seco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0).

Daley, Daniel, *God’s Will and Testament: Inheritance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and Jewish Tradition*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21).

Doering, Lutz, “4QMMT and the Letters of Paul: Selected Aspects of Mutual Illumination,”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Pauline Literature*, ed. Jean Sébastien Rey (Leiden: Brill, 2014), 69–88.

Dupont-Sommer, André, *The Dead Sea Scrolls: A Preliminary Survey*, trans. E. Margaret Rowley (New York, NY: Macmillan, 1952).

Eisenman, Robert,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First Christians* (Shaftesbury: Element, 1996); idem., *The New Testament Code: The Cup of the Lord, the Damascus Covenant, and the Blood of Christ* (London: Watkins, 2006).

Fitzmyer, Joseph A., “The Qumran Scrolls and the New Testament after Forty Years,” *RevQ* 13.1 (1988): 609–620.

Flint, Peter,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n *The Meaning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Judaism, Jesus, and Christianity*, ed. James C. VanderKam and Peter W. Flint (San Francisco, CA: HarperSan-Francisco, 2002), 362–80.

Frey, Jörg, "Die Texte von Qumran und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nach 75 Jahren: Erträge, Einsichten und Aufgaben," in *Qumran and the New Testament*, ed. Jörg Frey (Leuven: Peeters, 2024), 3–34.

Frey, Jörg, *Qumran and Christian Origins*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22).

Frey, Jörg, *Qumran, Early Judaism, and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ed. Jacob N. Cerone, WUNT 42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9), 403–428.

Frey, Jörg, "The Impact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on New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Proposals, Problems, and Further Perspectives," in *The Bibl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 Princeton Symposium on the Dead Sea Scrolls*, ed. James H. Charlesworth, 3 vols.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6), 3:407–61.

Fuglseth, Kåre Sigvald, *Johannine Sec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A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mpl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Gospel of John, Philo and Qumran*, SNT119 (Leiden: Brill, 2005).

Goff, Matthew J., "Being Fleshly or Spiritual: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 and Exegesis of Genesis 1–3 in 4QInstruction and First Corinthians," in *Christian Body, Christian Self: Concepts of Early Christian Self-hood*, ed. Clare K. Rothschild and Trevor W. Thompson, WUNT 28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1), 41–60.

Goff, Matthew J., "Discerning Trajectories: 4QInstruction and the Sapiential Background of the Sayings Source Q," *JBL* 124.4 (2005): 657–73.

Hartin, Patrick J., "'Who is wise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you?' (James 3:13): An Analysis of Wisdom, Eschatology, and Apocalypticism in the Letter of James," in *Conflicted Boundaries in Wisdom and Apocalypticism*, Wright, ed. Benjamin G. Wright & Lawrence Wills (Atlanta, GA: SBL, 2005), 149–68.

Jassen, Alex P., "Violent Imaginaries and Practical Violence in the War Scroll," in *The War Scroll, Violence, War and Peace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Essays in Honor of Martin G. Abegg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 Kipp Davis et al., STDJ 115 (Leiden: Brill, 2015), 173–203.

Johns, Loren L.,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Apocalypse of John," in *The Bibl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 Second Princeton Symposium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 Origins*, ed. James H. Charlesworth, vol. 2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6).

Kuhn, Karl George, "Die in Palästina gefundenen hebräischen Texte und das Neue Testament," *ZTK* 47 (1950): 192–211.

- Leaney, A. R. C. "The Johannine Paraclete and the Qumran Scrolls." in *John and Qumran*, ed. James H. Charlesworth (New York, NY: Crossroad, 1972), 38–61.
- Lim, Timothy, "Studying the Qumran Scrolls and Paul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s Background to Postbiblical Judaism and Early Christianity* (Leiden: Brill, 2003), 135–56.
- Lim, Timothy, *Holy Scripture in the Qumran Commentaries and Pauline Letters* (Oxford: OUP, 1997).
- Lockett, Darian, "The Spectrum of Wisdom and Eschatology in the Epistle of James and 4QInstruction," *Tyndale Bulletin* 56 (2005): 131–48.
- Moffitt, David M., *Atonement and the Logic of the Resurrection i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SNT 141 (Leiden: Brill, 2011).
- Morris, Michael, *Warding off Evil: Apotropaic Tradition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Synoptic Gospels*, WUNT 2451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7).
- Murphy-O'Connor, Jerome, *Paul and Qumran: Studies in New Testament Exegesis* (Priory Press, 1968).
- Newton, Michael, *The Concept of Purity at Qumran and in the Letters of Paul*, SNTSMS 53 (Cambridge: CUP, 1985).
- O'Callaghan, José, "Papiros neotestamentarios en la cueva 7 de Qumran?" *Biblica* 53 (1972): 91–100.
- O'Day, Gail R. "Johannine Theology as Sectarian Theology," in *What Is John? Volume 1: Readers and Readings of the Fourth Gospel*, ed. Fernando. F. Segovia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6), 199–203.
- Pixner, Bargil, "The Church of the Apostles Found on Mount Zion," *BAR* 16.3 (1990): 16–35.
- Rey, Jean-Sébastien (ed.),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Pauline Literature*, STDJ 102 (Leiden: Brill, 2014).
- Reynolds, Benjamin E., "Apocalyptic Revelation in the Gospel of John: Revealed Cosmology, the Vision of God, and Visionary Showing," in *The Jewish Apocalyptic Trad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estament Thought*, ed. Benjamin E. Reynolds and Loren T. Stuckenbruck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7), 109–130.

Riesner, Rainer, "Jesus, the Primitive Community, and the Essene Quarter of Jerusalem," in *Jesus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ed. James H. Charlesworth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93), 198–234.

Sander, E. P., *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77).

Stuckenbruck, Loren T., *The Myth of the Rebellious Angels: Studies in Second Temple Judaism and New Testament Texts*, WUNT 33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161–186.

Stuckenbruck, Loren T.,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Qumran and the Bible: Studying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Light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ed. Nóra Dávid and Armin Lange (Leuven: Peeters, 2010), 131–70.

Thiede, Carsten Peter, *The Earliest Gospel Manuscript? The Qumran Fragment 7Q5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Grand Rapids, MI: Paternoster, 1992).

Thiering, Barbara, *Jesus the Man: A New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Dead Sea Scrolls* (New York, NY: Doubleday, 1992).

Thiessen, Matthew, *Jesus and the Forces of Death: The Gospels Portrayal of Ritual Impurity within First Century Judaism*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20).

Tiller, Patrick A., "The Rich and Poor in James: An Apocalyptic Ethic," in *Conflicted Boundaries in Wisdom and Apocalypticism*, Wright, ed. Benjamin G. Wright & Lawrence Wills (Atlanta, GA: SBL, 2005), 169–79.

Vermes, Geza, *The Complet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 (New York, NY: Penguin, 1977).

Wassén, Cecilia, "Halakhah at the End of Days: A Comparison between Jesus's Teaching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Qumran and the New Testament*, ed. Jörg Frey (Leuven: Peeters, 2024), 101–128.

Wilson, Edmund, *The Scrolls from the Dead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Wold, Benjamin, *Qumran Wisdom and the New Testament: Exploring Early Jewish and Christian Textual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Wold, Benjamin, "Agency and Raising the Dead in 4QPseudo-Ezekiel and 4Q521 2 ii," *ZNW* 103.1 (2012): 1–19.

Yadin, Yigael, *The Temple Scrolls*, 3 vols.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77).

Yarbro Collins, Adela, "The Dream of a New Jerusalem at Qumran," in *The Bibl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 Second Princeton Symposium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 Origins*, ed. James H. Charlesworth, vol. 2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1–54.